

小学语文教科书插图中的中华文化符号研究

张菁, 王文秀

摘要:中华文化符号承载着国家和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是形成民族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纽带。统编小学语文教科书插图中的中华文化符号,根据符号与对象的关系,可分为像似性生活表象符号、指示性精神意象符号和规约性话语意指符号。这一符号序列构建小学生“认识表象—体悟意象—认同意指”的中华文化体认路径,整体表现出像似直观、密度递增和意指明确的特点。基于视觉语法分析框架,从表征、互动、构图三个维度解读中华文化符号的视觉语义,可发现中华文化符号视觉表达的优化策略:规约中华文化符号的视觉再现,强化中华文化符号的视觉互动,优化中华文化符号的视觉构图。

关键词:教科书插图;中华文化符号;视觉语法;统编小学语文教科书

中图分类号:G6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186(2025)12-0075-06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强调:“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1]中华文化符号是中华文化的直观表现形式,是铸牢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纽带。教科书插图中的中华文化符号选择与呈现,已成为图像时代教科书研究的重要课题。本研究旨在借助视觉语法的分析框架,以统编小学语文教科书(以下简称“统编教科书”)为分析对象,揭示中华文化符号在教科书插图中的呈现特征,从表征、互动和构图三个维度解读其视觉语义,在此基础上提出视觉表达的优化建议。

一、统编教科书插图中中华文化符号的视觉表征

文化是用特定方式组织起来的符号系统。^[2]符号作为文化发展的历史沉淀,不仅是人们精神

交流、思想沟通的中介,更是揭示、表达、传播社会意义和文化内涵的关键载体。^[3]纵观文化发展轨迹,人类记录历史和表征世界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以语言文字为主要载体的线性、历时、逻辑的记述;二是以图像符号为主要载体的面性、共时、感性化描绘。^[4]这两种方式分别形成了“语符”和“象符”两类基本原型符号。从这一理论视角看,教科书是按照一定规则编制的表意的符号系统^[5],遵循“语象合治”的文化符形编码逻辑。不同于“语符”有序书写的特征,作为“象符”主要表现形式的插图能够让学生体验到“线条(色度、颜色)的流动在场的感染”^[6],从而成为凝聚生产实践、生活方式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多维文化要素的复合体。根据符号与对象的关系,可将符号分为像似符号(icon)、指示符号(index)、规约符号(symbol)^[7]。在此基础上,剖析中华文化符号

基金项目:2024年度人民教育出版社“十四五”规划重点课题“中小学教材高质量使用的理论构建与实现路径研究”(2024GHE02)。

作者简介:张菁,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48);王文秀,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48)。



的层次,则构成“表象符号—意象符号—意指符号”的符号体系^[8]。

(一) 符号序列:表象符号、意象符号和意指符号

中华文化符号是代表中华文化特色并具有高度影响力的象征形式系统,凝聚着民族智慧和民族精神,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具有抽象性、象征性和共识性等特征。^[9]统编教科书插图中的中华文化符号,从纵向上可分为像似性生活表象符号、指示性精神意象符号和规约性话语意指符号三类,其总体结构呈现出从具象到抽象、从表层到深层的符号序列特征。这种分类方式突破了传统教科书插图“形式—功能”的分类框架,构建了中华文化“表象—意象—意指”的视觉认知框架。这一框架揭示了小学生在认识、体悟和认同中华文化的心理路径:从像似性生活表象符号的直观感知到指示性精神意象符号的情感共鸣,再到规约性话语意指符号的文化认同,逐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像似性是图像符号的主导编码原则,指图像对现实对象的视觉模仿特性^[10],对作用于人类心理感知的对象性状进行文化习得解释^[11]。像似性生活表象符号是小学生最直观接触到的中华文化符号形式,这类符号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主要呈现中华文化的能指,即具体的、可感知的物质、技艺或行为。在统编教科书插图中,像似性生活表象符号主要包括建筑类、服饰类、食品类等物质文化符号,戏剧、剪纸、书法等传统艺术形式为代表的技艺文化符号,节日与习俗等为代表的行为文化符号,等等。这类符号主要通过形象像似、结构像似和主题像似,帮助学生了解中华民族的日常生活、习俗风俗和行为方式,逐步建构感知中华文化的表象系统,为进一步深化文化认知奠定基础。

指示性是符号与对象之间的某种关系,特别是因果关系、邻接关系、部分与整体关系等,其作用是将解释者的注意力吸引到特定的对象上。^{[7]80}指示性精神意象符号围绕民族精神的意义框架,通过因果关系、时空关联等关系编码,将抽象的民族精神具象化为可感知的视觉符号,形成中华民族精神的记忆锚点。在统编教科书插图中,指示性精神意象符号主要呈现历史事件、

经典场景、英雄事迹等“富于孕育性的那一顷刻”,通过视觉叙事与象征编码还原或建构一些历史事实原貌,以此触发学生的民族情感共鸣,从而实现文化记忆的再生产,加深学生对中华民族精神的理解与体悟。

文化语境铺设了一种规约性的意义场域,当视觉符号的释义实践超越了基本层面的相似逻辑,其意指实践则遵循文化层面的规约逻辑^[12],主要体现为对某种普遍共享的文化符码的征用^{[13]117}。教科书插图作为文化表征的视觉符号,天然地具有约定俗成的文化规约属性。^[14]规约性话语意指符号是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意指的国家政治话语的视觉凝练。在统编教科书插图中,规约性话语意指符号与国家主权、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紧密相关,主要包括国旗、国徽、国家版图等,对于培养学生的文化认同感、国家认同感、民族自豪感具有重要意义。这类中华文化符号将文化精神、思想理念、价值观念整合为统一的中华民族身份标识,回答了“我们是谁”“我们的使命是什么”等根本性问题,从而实现从文化记忆到政治信仰的意义升华。

(二) 视觉呈现:像似直观、密度递增和意指明确

首先,像似性生活表象符号在统编教科书插图中占比最高。图像作为视觉符号载体,具有指涉性、象征性、类比性与痕迹性等天然优势^[15],其直观性、真实性明显优于文字符号的抽象表达。依据记忆内容的信息类型,可将记忆分为语义记忆与情节记忆两种类型。语义记忆以语言符号为信息贮存载体,情节记忆则以图像符号为主要存储形式。相较于语义记忆的严谨性、逻辑性,情节记忆具有鲜明性、真切性、贴近刺激物的物理属性。^{[16]140}像似性生活表象符号能够通过图像叙事的方式有效激活学生的情节记忆与情感联结,将抽象的文化概念转化为可感知的心理图式,从而实现文化记忆的结构化存储与情境化提取。

其次,统编教科书插图中的中华文化符号总量呈现明显递增趋势,相邻学段符号密度增幅显著。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其符号表征能力逐步发展,处于具体运算阶段(7—12岁)的儿童思维已经具有明显的符号性和逻辑性特征。^{[16]43}随着学段升高,统编教科书插图中的指示性精神意



象符号和规约性话语意指符号的比例逐渐增加,像似性生活表象符号占比自然回落。这种符号类型的结构性变化,与第三学段的学生即将过渡至形式运算阶段的认知发展规律相契合,彰显了教科书编排对学生认知发展规律的充分遵循。

最后,统编教科书插图中的中华文化符号具有明确的意指指向性,通过将流动的图像意义锚定在特定的语义坐标系统中,实现了中华文化符号的意义澄明。传统观点认为,语文教科书必然以语言符号为中心,遵循文本优先的线性逻辑,然而,图像时代的语文教科书已逐步转向了空间性语象合洽、并置与竞争的模式,传统的时间性语本位的语象关系被取代。在新型关系中,插图与文字相互协同、彼此诠释,实现了中华文化符号表征从“形似”向“神传”的跃迁。这种符号表征模式将中华文化符号的意指活动锚定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与民族文化传统所共同认可与推崇的文化精神、思想理念、价值观念等核心语义之上,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向学生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实现对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

二、统编教科书插图中中华文化符号的语义解读

视觉语法理论提供了把握图像形式的语义法则,系统阐释了图像构成维度的意指原理、要素关系和意义法则。^[17]视觉符号的意义系统分为三种类型:认知呈现的表征意义、人际交流的互动意义和视觉布局的构图意义。^{[13]243}这一分析框架为准确、全面地解读中华文化符号的视觉语义提供了理论支撑。

(一) 表征语义:两类视觉再现的图景勾勒

体现表征意义的图像结构可分为叙事型再现(narrative structure)和概念型再现(conceptual structure)两大类。^{[18]55}叙事型再现强调行为或事件过程,展现“做什么”的动态特征,包含行动、反应、言语和心理等过程;概念型再现则强调事物的普遍、稳定特征,展现“是什么”的本质内涵,包括分类、分析和象征等过程。叙事型再现通过情境化的表达手法,生动再现了日常生活场景、传统节日氛围、神话与文学意境等文化情境,让学生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认知中华文

化的内涵。概念型再现则挖掘中华文化符号背后的“所指”意义,通常以暗示、象征、隐喻等方式,指向文化深层的审美取向、民族情感、精神追求、价值观念以及道德规范等精神内核。统编教科书插图中的中华文化符号以叙事型再现为主要表现形式,其中,行动过程占比较高且增幅显著,反应、言语、心理过程占比相对较低。概念型再现虽整体略有增长,但分类过程占比较高,象征过程和分析过程占比相对较低。总体而言,统编教科书插图中的中华文化符号通过叙事型再现与概念型再现的有机结合,从生活的真实性和符号的象征性两个维度全面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为学生建构了体认中华文化的视觉图景。

(二) 互动语义:四种语法手段的综合运用

互动语义旨在揭示图像生产者与观看者之间的交流方式与认知态度,通过接触(contact)、距离(social distance)和态度(attitude)三种视觉语法手段来实现;情态与效度(modality and validity)反映的是图像信息的真实度和可信度^{[18]143-150},也一并在此维度论述。统编教科书插图中中华文化符号的互动语义呈现出提供型接触占主导、公共距离为主要呈现方式、主观视角明显增加和图像可信度高等主要特点。

接触维度主要关注图像主体与观众之间的视觉连接关系,即是否建立了眼神接触。这种视觉连接可进一步细分为两种关系结构:提供型接触与索取型接触,分别代表图像中主体的不同出场策略及其与观众的视觉互动关系。在提供型接触中,图像主体的视线方向不直接对准镜头或存在视角的偏离,为观者“提供”某种情境或背景信息;索取型接触则通过图像主体直接与镜头产生眼神交汇,试图从观众那里索取某种情感或认知上的关注,邀请观者直接回应主体的视线,形成双方互动的关系。统编教科书插图中的中华文化符号在接触维度呈现出提供型接触占主导且显著增长、索取型接触数量较少且波动较大的特点。随着年龄增长,学生对于复杂、抽象视觉信息的解读能力逐渐增强,接触频次的整体增加,尤其是提供型接触的显著增长,为学生展现了更为广阔的文化景观,有助于拓展其文化认知视野。

距离维度反映了图像再现主体与观者之间的亲密度,与镜头取景的远近有关,由远及近形成



了公共距离、社会距离和亲近距离三个层次。亲近距离主要体现家庭、亲情及友情等亲密人际纽带；社会距离更多展现了尊重、礼仪及正式场合的人际互动；公共距离则主要展现历史、文化的全景风貌。统编教科书插图中的中华文化符号，在距离维度呈现出公共距离占比最高且增幅明显、社会距离占比次之、亲近距离数量最少的特点。公共距离的取景方式，全景式、共时性地再现了中华文化景观，有助于学生突破细节局限，建立对中华文化的宏观认知体系。

态度维度作为图像意义建构的关键因素，决定了观者如何看待图像中的主体，影响观者的认知过程和情感体验，主要分为主观态度与客观态度两大类。客观态度涉及图像的行动取向和知识取向。主观态度包括体现介入程度的水平视角和反映权力关系的垂直视角。统编教科书插图中的中华文化符号以客观态度呈现为主，旨在确保中华文化呈现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帮助学生建立客观的文化认知基础；行动取向的数量较多，强调文化的实践性和动态性特征，引导学生在行动中理解文化的价值；主观态度增幅明显旨在密切学生个体与中华文化的联系，强化学生的情感代入和文化认同。

情态与效度维度反映了图像呈现现实的真实程度，主要涉及两个层面，即效度标记和编码取向。效度标记通过图像的色彩饱和度、分辨率和色调等视觉参数的差异影响观者对图像真实性的感知。统编教科书插图中的中华文化符号，通过高色彩饱和度、高分辨率、色调和谐的参数配置，既满足了学生对于视觉体验的审美需求，又有效传达了中华文化求真、求实的精神追求。编码取向旨在表达不同语境中的情态判定标准，主要分为自然主义编码取向、科技编码取向、感官编码取向和抽象编码取向。^{[16]164}统编教科书插图中的中华文化符号以感官编码取向为主，注重激发学生对中华文化的动态感官体验。

（三）构图语义：三维语法规则的协同布局

构图语义主要强调图像整体层面的要素合成逻辑和协同内涵^{[13]246}，通过信息值（information value）、框架（framing）和显著性（salience）三个具有内在关联的语法规则实现意义建构^{[18]216}。统编教科书插图中的中华文化符号在构图语义维

度呈现出信息负载值高、分割框架占主导以及显著性突出的特点。

信息值反映了页面不同区域元素的信息价值差异。图像上部通常代表“理想”，信息值较高，下部则象征“现实”，信息值较低。图像左侧元素通常承载“已知”信息，右侧元素则负载“新”信息，信息值较高。中心位置元素体现核心信息，拥有更高的信息值，边缘位置的元素则代表次要或辅助信息。统编教科书中的插图与文字主要采用垂直布局 and 中心布局两种形式呈现，较少采用水平布局，其中，中华文化符号往往处于页面的中心位置，承载着更为重要的信息价值。

框架主要反映图像中元素的取景范围和归属关系^{[13]247}，包括连接框架和分割框架。连接框架关注元素间的视觉连续性，主要通过取景装置离场、矢量线的关联以及色形的连续性和相似性来实现意义连接。分割框架强调元素间的视觉隔离，主要通过分割线、框架装置、元素间的空白区域以及色形的不连续性达成意义区分，以突出不同区间的独特性。统编教科书插图中的中华文化符号在框架维度以分割框架为主要呈现方式，运用留白隔离、边界强化、框架装置等手法，强化中华文化符号的视觉表达效力。

显著性反映了图像中不同元素对于观看者的吸引程度。^{[13]246}空间布局（位置、大小、叠加层次）、色彩感知（明度、锐度、饱和度）等参数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的视觉注意力分配。统编教科书插图中的中华文化符号总体呈现高显著性特征，通常被放在前景位置，尺寸较大，没有被其他元素遮挡，采用高饱和度的色彩，确保图像清晰，有助于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三、统编教科书插图中中华文化符号的编用优化

教科书插图作为知识和文化的视觉表征载体，是融合知识理解与文化传承的教育性文本。^[14]统编教科书通过场景再现、情感互动与构图设计将中华文化符号有机融入插图系统，建立学生对中华文化的情感认同。

（一）表征：规约中华文化符号的视觉再现

一方面，需要明确不同类型文化符号的表征特点和适用边界，建构分类分级的中华文化符号



图谱体系。像似性生活表象符号指向中华文化的物质载体与生活实践,通过写实手法直接复现文化现象。此类符号在教科书插图中的呈现应强化场景还原,建构符号集群网络,帮助学生建立中华文化认知的整体框架。指示性精神意象符号作为文化精神的隐喻桥梁,通过因果关联或时空关联指向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其意义生成依赖符号与所指对象的经验性关联,需要借助文化语境完成意义解码。考虑到学生以具象思维为主导,抽象逻辑和历史文化经验有限,可通过视觉降维与情感浸润等策略,将指示性精神意象符号的深层隐喻转化为易于感知的形象、情境、情感。规约性话语意指符号承载国家意志与意识形态内涵,其意义生成依赖社会规约与制度共识,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具有任意性和规约性特征。教科书插图设计应通过图文互释明确符号意指,改变刻板印象,在学生心中播下文化认同的种子,实现语文学科的育人目标。

另一方面,基于中华文化符号的内在属性与认知目标,合理选择叙事型再现与概念型再现的视觉表达方式。叙事型再现适用于动态性、过程性、情境性的中华文化符号,应突破单一行动过程的扁平化叙事局限,增加言语、反应和心理过程的呈现比重。概念型再现适用于结构性、系统性、抽象性的中华文化符号,需要提升分析过程、象征过程的表达,揭示符号背后的文化内核,通过符号并置与关联设计,展现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让学生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多元一体。

(二) 互动:强化中华文化符号的视觉互动

首先,建构近距离的视觉接触机制,消解中华文化符号的时空疏离感。增加索取型接触和近距离的运用,尤其是人物特写处理。以鲁迅肖像插图为例,鲁迅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更是一种文化符号。鲁迅的半身肖像呈现在六年级上册的教科书中,通过直接的视线交流和亲近的空间距离,拉近学生与鲁迅的心理距离,形成从“他者”到“我们”的文化认同。可以通过视线牵引、动作延伸等索取型接触设计手法,赋予插图中的形象以邀请和互动的姿态,打破单向式观看的传统呈现方式,促使学生从文化旁观者转向文化参与者。

其次,动态调整视觉取景视角,搭建文化体认的双通道。《开国大典》的插图采用客观视角中的行动取向取景,全景式展现开国大典的盛况。《故宫博物院》的平面示意图运用客观视角中的知识取向,呈现故宫布局的事实性信息。鲁迅肖像则采用垂直视角中的平视角度,意在建立平等、对话的视觉关系。中华文化符号的取景视角设计应平衡主客观视角的使用,综合考量取景的内容特征、学生的认知需求、教学目标等因素,既保证学生客观、全面地认识中华文化,又引导学生形成个性化的文化体认。

最后,增加自然主义取向的视觉呈现,强化文化符号的“现实观照”功能。适当增加反映社会现实和文化景观的自然主义取向的图像,让小学生更直观真实地见证中华文化的演进与嬗变,实现从“符号审美”到“现实观照”的转变。教科书插图的互动设计本质上是建构“文化符号—学生主体”的双向对话机制,推动中华文化从静态知识存储向动态意义再生产转变,确保中华文化得以在代际传递中保持生命力,实现传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

(三) 构图:优化中华文化符号的视觉构图

首先,基于视觉语法理论,科学规划文化符号的空间布局与位置关系。根据中心—边缘法则,将重要的文化符号置于页面中心位置;运用左—右时序编码,遵循“已知—新知”的认知规律;通过上—下层级隐喻,明晰文化符号所负载的信息值。以《金色的鱼钩》插图为例,老班长的形象位于整个画面的中心位置,承载了最高的信息值,向学生传达了红军战士忠于革命、舍己为人的崇高精神。

其次,根据视觉显著性原理,避免文化符号的均质化呈现。通过色彩、尺寸、对比度等视觉参数的调整,强化中华文化符号的视觉吸引力,使其成为视觉锚点。高显著性的中华文化符号能够避免低年级学生在复杂画面中陷入不知该看什么的迷茫,强化他们文化记忆的形成。

最后,灵活运用分割框架与连接框架,编织文化符号的意义网络。分割框架通过线条、色块与留白界定独立意义单元,强化“一框一主题”的模块化学习效果;连接框架则以色彩渐变或元素重叠,建构图文呼应的意义网络。通过框架设



计的灵活运用,突破传统图文分离的线性叙事,形成“文以象尽,象以言著”的有机整体,有助于学生在“解构—整合”中实现中华文化的深度解码与意义建构。

综上所述,统编教科书插图中中华文化符号的编用优化需要从表征规约、互动强化和构图优化三个维度协同推进。通过科学的视觉设计策略,推动中华文化符号的视觉再现从“无序陈列”向“意义矩阵”转变,探索“以图载道、观图悟道”的育人新路径,为培养具有文化自信的时代新人提供有力支撑。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 9.
- [2] 康澄. 文化及其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理论研究 [M]. 南京: 河海大学出版社, 2006: 7.
- [3] 马慧. 中华文化符号的共享机制研究 [J]. 文化遗产, 2025 (1): 2.
- [4] 朱永明. 视觉语言探析: 符号化的图像形态与意义 [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1.
- [5] 王攀峰. 教科书研究方法论 [M].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19: 120.
- [6] 利奥塔. 话语, 图形 [M]. 谢晶,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262.
- [7] 赵毅衡. 符号学: 原理与推演 [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 [8] 刘莉. 中华文化符号的层次、特征与传播 [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3): 95.
- [9] 高承海, 秦佳佳, 孟松. 文化符号构建中华文化认同的心理机制与传播路径 [J]. 民族教育研究, 2024 (6): 147.
- [10] 孟华. 汉字主导的文化符号谱系 [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14: 308.
- [11] 胡易容. 图像符号学: 传媒景观世界的图式把握 [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4: 52.
- [12] 张伟. 符号互文、情境衍义与文化规约: 当代视觉修辞的语境参数及其意指实践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5): 162.
- [13] 刘涛. 视觉修辞学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
- [14] 张菁, 王文秀. 教科书插图的本质特征、育人理据与施教路径: 基于符号学的视角 [J]. 教育科学研究, 2025 (3): 52.
- [15] 徐小蛮, 王福康. 中华图像文化史: 插图卷 (上) [M]. 北京: 中国摄影出版社, 2016: 5.
- [16] 陈英和. 认知发展心理学 [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 [17] 刘涛. 图像研究的语义系统及其视觉修辞分析方法 [J]. 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 (4): 37.
- [18] KRESS G, VAN LEEUWEN T. 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 (third edition) [M]. London: Routledge, 2021.

(责任编辑: 邝逸宁)

Research on the Chinese Cultural Symbol in Illustration in Primary School Chinese Textbook

Zhang Jing, Wang Wenxiu

Abstract: Chinese cultural symbol carries the cultural memory of a state and nation, which serve as a cultural link for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fostering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a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ymbol and object, the symbol in illustration in the unified primary school Chinese textbook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iconic symbol representing life, indexical symbol pointing to spiritual imagery, and regulative symbol signifying dialogue meaning. This sequence of symbol constructs a path f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to recognize Chinese culture, progressing from understanding appearance to experiencing imagery and then to identifying signification, display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conic direction, increased number and specifically significant. By introducing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visual grammar, the visual semantics of Chinese cultural symbol can be interpreted from the dimensions of representation, interaction and composition. To optimize the visual expression of the symbol, we should regulate the visu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symbol, enhance the visual interaction of it and improve the visual composition of it.

Key words: textbook illustration; Chinese cultural symbol; visual grammar; unified primary school Chinese textbook

